

# 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与迈向中高端研究<sup>\*</sup>

楠 玉 袁富华 张 平

[摘要] 基于增长追赶系数以及稳定增长效率三角模式特征, 本文通过对中国各省增长追赶和动力机制进行考察后发现, 东部、中部省份增长趋于收敛, 增速稳定回升。其中, 东三省等重化工业集中的资源型省份增长分化较为严重; 发达省份由工业化向城市化模式转型中面临增长动能转换问题, 而知识消费不足会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造成阻碍; 部分中西部省份能实现对发达省份的有效追赶, 而有些省份由于基础薄弱, 虽表现出较快增速, 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能力较弱, 持续有效追赶面临阻碍。

[关键词] 区域协调发展; 增长追赶; 增长动能转换; 中高端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18) —02—0036 (06)

[作者] 楠 玉,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袁富华, 研究员,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张 平, 研究员,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 一、引言

2016年, 中国人均GNI为8260美元, 依据世界银行2012年给出的划分标准, 中国仍然处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收入区间为3975~12276美元), 离跨越高收入门槛仍有一段距离。然而, 在历经了改革开放30多年平均增速达到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后, 2012年至今GDP增速持续下滑, 中国经济正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要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 需要保持当前的中高速增长水平, 同时要积极实现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sup>[1]</sup> 提高增长质量, 有效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由于中国各个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梯队, 有效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也存在差异。<sup>[2]</sup> 因此, 要实现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整体经济水平提升, 必须有效推进各个区域的增长动能转换和增长质量提升, 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发展, 才能

摆脱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威胁, 更好更快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区域增长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分支是关于区域增长收敛的讨论。一方面, 一些学者就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收敛展开研究。Barro (2016) 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 GDP增速已经由 $\beta$ 收敛约束逐渐转变为 $\sigma$ 收敛约束;<sup>[3]</sup> 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各省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进行考察;<sup>[4-5]</sup> 另一方面, 对不同区域的收敛速度进行测算。不同学者由于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时间区间各异, 测算出的区域收敛速度也有些差异, 如, 林毅夫和刘明兴 (2003) 发现, 1981~1999年期间中国各省增长收敛速度为7%~15%;<sup>[6]</sup> 彭国华 (2005) 的研究与之接近, 测算出中国各省1982~2002年增长收敛速度为7.3%;<sup>[7]</sup> 而Demurger et al. (2002) 测算出的收敛速度较高, 1985~1998年间收敛速度达到13%~21%。<sup>[8]</sup> 另一些学者对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展开研究。如, 齐绍洲等 (2010) 考察

\*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人力资本配置扭曲、结构转型与效率模式重塑研究”(2016M6012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研究”(12&ZD084)。

了区域能源强度与区域收入差距的收敛性。<sup>[9]</sup>李静等(2015)从区域增长加速和增长减缓的角度也间接佐证了这一观点,发现中国经济经过阶段性加速增长后,增长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发达和沿海省份增长区域平稳。<sup>[10]</sup>马孝先(2017)对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生驱动因素及多重耦合机制进行了研究。<sup>[11]</sup>

有关增长动力机制的研究,多是从国家层面就当前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发生机制展开讨论。如,张平、王宏森(2010)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结于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等偏高收入阶段后,不能很好应对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从而陷入长期徘徊的情形。<sup>[12]</sup>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转换增长机制,是增长受阻的直接诱因。<sup>[13]</sup>靳涛和陶新宇(2015)从生产要素、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3个层面考察了中国不同时间段的增长动力机制。<sup>[14]</sup>刘长庚和张磊(2017)从需求拉动力和供给推动力两个系统角度出发,探讨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既要增加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同时也要把握结构调整契机,重视创新和要素升级,借助制度改革从供给层面增强长期增长动力。<sup>[15]</sup>中国各个区域由于增长水平差异处于不同的增长梯队,面临的增长动力转换要求也不相同。因此,只有认清不同区域的增长现状和面临的阻碍,才能更好地通过区域增长动能转换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必须遵循的重要发展理念。近年来,中央不断推出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促进中国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实现区域增长动力转换,激发新的增长活力。新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区域的协调发展和平衡发展,如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的带动引领作用,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缩小东中西部增长差距,从而实现东中西协调发展布局;同时,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环渤海区域合作开发,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南北区域差距缩小,实现南北增长的平衡格局。

由此看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就是要欠发达省份在实现增速追赶的同时,提升增长质量,从根本上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实现向发达省份的收敛和整体经济迈向中高端的发展目标。因此,本文兼顾增长速度追赶和增长质量追赶,对中国各个省份的经济追赶情况进行考量,同时,依据跨国增长经验显示的有效实现对高收入经济体的追赶需要满足“高劳动生产率,高消费能力和高资本深化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条件,<sup>[16]</sup>来对中国各省增长追赶和增长动能转换情况进行考察。

## 二、中国各省增长追赶情况

### 1. 增长追赶的界定

本文对区域增长差距的研究,同时兼顾区域增长速度追

赶和追赶过程中的增长质量提升过程,通过界定增长追赶系数来反映不同省份追赶发达省份所需时间,追赶时间越短,则表明与发达省份增长差距不断缩小;追赶时间越长,则表明增长差距在不断扩大。由此,各省份成功实现向发达省份追赶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T_c = \ln G_t / \ln \left( \frac{1 + g_u}{1 + g_d} \right)$$

其中, $G_t$ 表示各省与发达省份的收入差距; $g_u$ 为欠发达省份的GDP平均增长率; $g_d$ 为发达省份的GDP平均增长率; $T_c$ 可以理解为实现追赶上发达省份所需的时间。当某个省份与发达省份收入差距越大,即 $G_t$ 越大时,则增长追赶时间 $T_c$ 越长,追赶越困难;而当某个相对发达省份能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时,也即 $(1 + g_u) / (1 + g_d)$ 越大,则增长追赶时间 $T_c$ 将越短。 $T_c > 0$ ,反映出追赶省份收入水平较低但增速较快,或收入水平较高但增速较慢; $T_c < 0$ ,则反映出追赶省份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增速慢(上海例外,上海人均收入高于北京,其追赶系数小于零,反映出上海不仅收入水平高于北京而且增长较快)。以北京为参照,考察各省对北京的增长追赶情况。同时构造t统计量,对追赶系数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 2. 中国各省增长追赶情况

由表1可知,东部地区2008~2015年期间实现有效追赶的省份包括:福建、江苏、山东、海南。2016年上半年,福建、江苏和海南仍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分别为8.3%、8.2%、8.1%。广东、江苏和山东GDP总量占据全国前三位,均超过3万亿元。其中,上海2008年以来增长赶超系数为-11.858,表明上海已经实现对北京的收入赶超,不仅收入较高而且增速较快。2016年上半年,上海与北京保持6.7%的同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已超过北京,位居全国第一。东部地区其他省份的GDP增速也都高于北京,经济收敛特征较为明显。中部地区中,2008年以来实现有效追赶的省份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中部和东部地区整体表现出较好的增长收敛情况,其中增长分化表现较严重的是东三省、内蒙古、山西以及河北等依赖资源和重工业发展的地区,山西和河北的追赶系数甚至为负值,表现出对发达省份的增长追赶能力较差。2016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GDP增速基本垫底,分别为-2.5%、6.9%、6.1%、4.5%、6.8%和7.2%,全国仅有的3个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包括黑龙江、山西和辽宁,辽宁GDP增长率甚至连续表现为负值。西部地区区域分化较为严重,2008~2015年间,能实现有效追赶的省份仅有3个:西藏、陕西和重庆。2016年,重庆和西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其GDP增长率均高于10%,排在全国前三,但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增速排名靠后。贵州GDP增速较高,为10.5%,其他省份青海、新疆、宁夏、甘肃增速在8%左右,虽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人均收入低,经济基础差,表现出经济追赶较为乏力。

表 1 各省分阶段增长追赶系数情况

省份	时间段(年)	追赶系数	省份	时间段(年)	追赶系数	省份	时间段(年)	追赶系数
福建	1985~2007	-2.738 (-0.056)	江苏	1985~2007	12.175 (0.200)	山东	1985~2007	13.982 (0.162)
	2008~2015	11.73*** (2.293)		2008~2015	13.865*** (2.016)		2008~2015	18.951*** (4.604)
海南	1985~2007	-9.99 (0.165)	上海	1985~2007	0.528 (0.024)	广东	1985~2007	1.283 (0.079)
	2008~2015	39.732*** (1.997)		2008~2015	-11.858 (-0.232)		2008~2015	25.501 (0.599)
浙江	1985~2007	3.277 (0.309)	辽宁	1985~2007	3.928 (0.057)	天津	1985~2007	-9.494 (-0.115)
	2008~2015	19.806 (0.794)		2008~2015	15.379 (0.564)		2008~2015	6.329 (1.16)
湖南	1985~2007	27.005 (0.144)	湖北	1985~2007	82.31 (0.344)	安徽	1985~2007	-30.974 (-0.294)
	2008~2015	15.895*** (3.723)		2008~2015	20.215*** (2.67)		2008~2015	21.852*** (2.342)
江西	1985~2007	0.532 (0.007)	河南	1985~2007	49.317 (0.207)	黑龙江	1985~2007	-67.732 (-0.395)
	2008~2015	22.952*** (3.545)		2008~2015	43.328* (1.525)		2008~2015	59.129 (0.587)
内蒙古	1985~2007	-18.385 (-0.291)	吉林	1985~2007	-3.226 (-0.038)	山西	1985~2007	-1.873 (-0.017)
	2008~2015	29.997 (0.75)		2008~2015	15.883 (0.238)		2008~2015	-5.533 (-0.097)
重庆	1985~2007	-0.345 (-0.003)	陕西	1985~2007	-8.305 (-0.084)	西藏	1985~2007	14.232 (0.224)
	2008~2015	11.896*** (2.545)		2008~2015	17.784*** (2.32)		2008~2015	32.32* (1.59)
甘肃	1985~2007	-16.993 (-0.138)	新疆	1985~2007	0.131 (0.0015)	宁夏	1985~2007	-15.237 (-0.26)
	2008~2015	165.222 (0.515)		2008~2015	53.784 (0.524)		2008~2015	38.656 (1.129)
云南	1985~2007	-55.578 (-0.348)	贵州	1985~2007	-54.122 (-0.31)	四川	1985~2007	28.499 (0.317)
	2008~2015	35.397 (1.234)		2008~2015	28.892 (1.473)		2008~2015	27.04 (1.424)
广西	1985~2007	-4.779 (-0.098)	青海	1985~2007	16.66 (0.123)	河北	1985~2007	13.981 (0.34)
	2008~2015	24.284 (1.437)		2008~2015	-97.46 (-0.305)		2008~2015	-16.861 (-0.109)

注: 括号内为追赶系数的t统计量值; 所有省份按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类整理, 为整理的方便, 将东部地区中河北省的情况移至表格最后。

数据来源: 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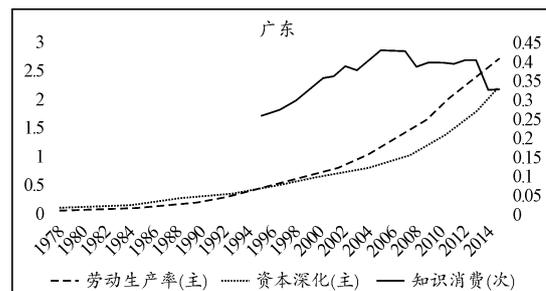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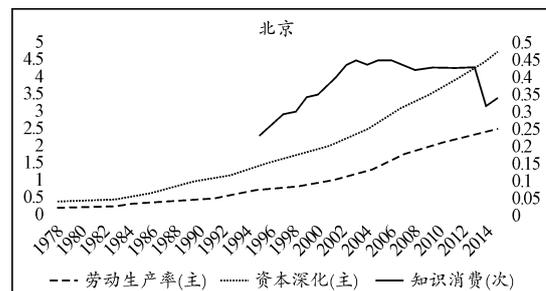
整体而言, 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外部冲击之后, 由于各地区所处增长阶段和发展能力不同, 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基本趋于收敛, 增速稳定回升。中部地区省份也表现出了较好的增长收敛迹象。而其中, 东三省及内蒙古、山西、河北等重化工相对集中的资源型省份增长分化现象较为严重, 这些地区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 增速下降较早, 追赶动力不足。西部区域也表现出增长分化迹象, 11个西部省份能有效追赶的仅有3个, 占比不到30%。多数省份近年来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增速放缓出现较晚, 但由于西部省份多数经济规模较小, 抗风险能力弱, 一旦出现增速较大幅度下降, 势必面临增长风险集聚、化解难度加大的局面。

### 三、中国区域内生增长动力机制及特征

工业化阶段规模效率模式的建立以及增长的维持, 在现实中还体现为区域间的相互作用, 特别是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权衡: 按照传统发展理论, 国内各地区之间, 较之于国别之间的极化效应可能更强, 且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的长期累积, 进一步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尤其是在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 发达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 将迫使欠发达地区经济潜力更加弱化。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传统发展理论非常重视区域一体化和整合, 不仅仅是区域间平衡的经济效率要求, 更重要的是社会凝聚力和稳定的要求。在经济减速和城市化转型时期,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顺应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含义正在于此。

2016年中国各省GDP增长率显示, 中西部省份多数排名靠前, 部分西部省份增速甚至保持在两位数水平, 如重庆(10.7%)、贵州(10.5%)、西藏(10%); 东部地区除了辽宁(-2.5%)外, 其他各省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7%), 多数省份增速处于中下游水平; 增速排名垫底的省份主要是东三省和山西、河北。

中西部地区增速表现较好, 但能否实现对发达省份的持续有效追赶, 则取决于其是否形成了有效的内在增长动力机制。跨国增长经验显示, 发达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 基本都依赖于“高劳动生产率, 高消费能力和高资本深化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模式。因此, 在分析区域增长追赶情况的基础上, 进一步借助劳动生产率、资本深化能力和知识消费指标, 考察中国各省份增长动能转换的有效性和增长的持续性(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东部代表性省份①

① 因篇幅所限, 各区域只选取两个代表性省份, 就其情况予以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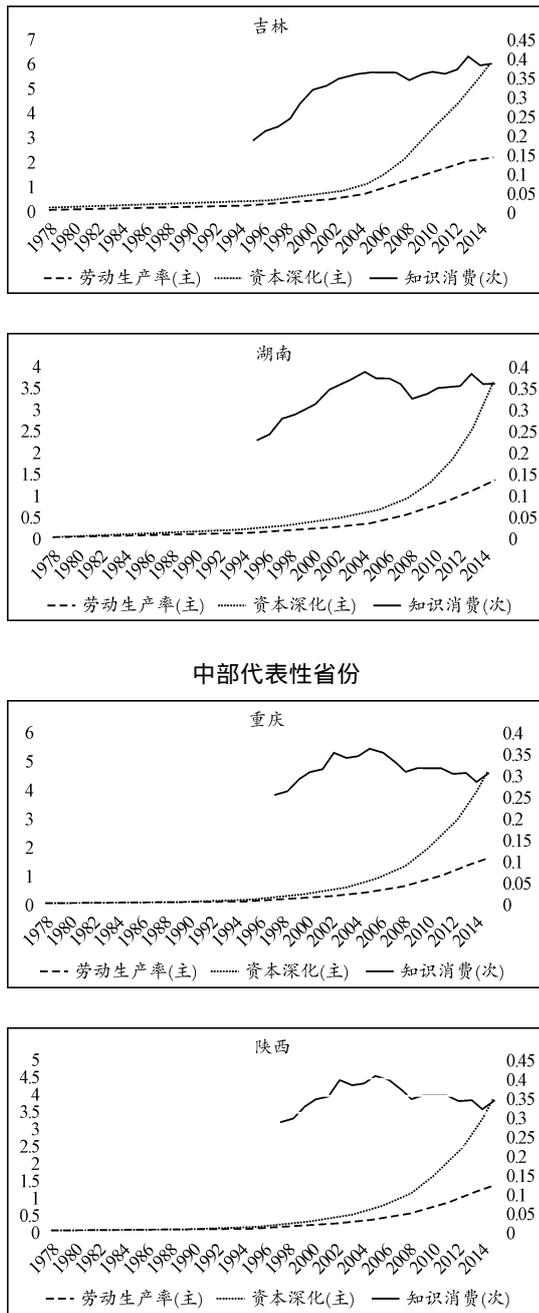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各区域劳动生产率、资本深化能力和知识消费能力情况

注：劳动生产率指标为劳均产出（Y/L），依据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计算而得；资本深化能力用劳均资本水平（K/L）反映，依据永续盘存法计算的以1978为基期的固定资产存量和就业人数计算而得；知识消费指标界定为居民消费支出中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支出占比，具体用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衡量。

数据来源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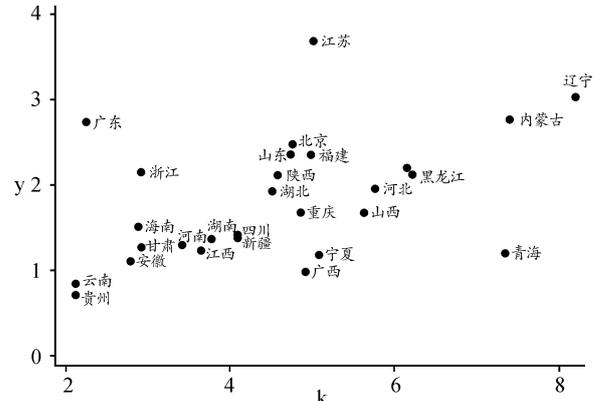


图2 各省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深化能力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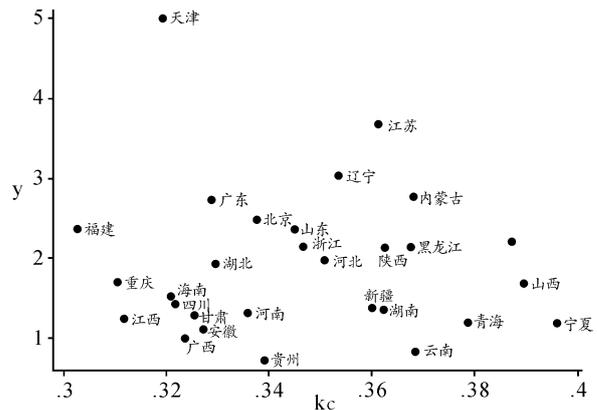


图3 各省劳动生产率与知识消费能力关系

不同区域省份增长机制和特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部发达省份已逐渐摆脱工业化阶段资本驱动主导的增长模式，部分中西部省份资本深化能力不强，可能导致增长动能不足。从图2可以看出，东部省份，如北京、江苏、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但劳均资本反映的资本深化能力较中西部地区相比，已不再占有绝对优势。图1中，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相比，劳均资本与劳均产出差距不断缩小，这表明东部地区对资本要素利用效率较高，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更大。其中，广东甚至出现了劳动生产率高于劳均资本的情形，这表明该地区经济增长已不再依赖于资本要素，技术、知识等要素已取代资本要素成为新的增长动能源泉。而部分中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安徽、甘肃等，不仅表现出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而且资本深化能力也较薄弱。当前，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没有通过工业化过程积累足够的资本，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却又面临发达省份进入城市化阶段带来的要素价格上涨和要素向发达省份集聚等问题，使得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挑战。

第二，东部发达省份居民知识消费需求不足，将对城市化阶段主要依赖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增长效率造成阻碍。从图3可知，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发达省份虽然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但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对应的较高的知识消费能力。

可见,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并没有通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由图1中各省知识消费支出占比变动趋势也可以看出,近年来东部省份多数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其他中西部省份变动则相对平稳。实际上,东部省份与其他省份相比,由于高房价造成居住消费项支出较高,挤占了其他项的消费支出,严重约束了对知识密集型服务项目的的需求,使得消费结构升级进展缓慢,这将不利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由此看来,发达省份当前面临由工业化增长模式向城市化模式转型所带来的增长动能转换问题,而知识消费不足可能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造成阻碍。部分中西部省份能够实现对东部发达省份的有效追赶,但也有一些省份由于基础较薄弱,虽然表现出较快的GDP增速,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能力较弱,不能形成持续有效追赶。发展较快的中西部省份多数具备较好的工业基础,能承接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从而实现较快增长。但快速工业化的路子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欠发达地区,有些地区自身不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一味推行工业化发展模式可能并不能起到促进发展经济的作用,反而会对环境和生态资源造成破坏。这些省份要实现增长追赶就要打破依靠工业化发展的路子,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 四、结论及建议

“十三五”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着重强调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基础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引领发展等,实现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依托的横向纵向经济轴带,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本文通过构建兼顾增长速度追赶和增长质量追赶的经济追赶系数,考察了中国各省的增长追赶情况,研究发现:第一,东部地区2008~2015年期间实现有效追赶的省份包括:福建、江苏、山东、海南。东部地区其他省份的GDP增速也都高于北京,经济收敛特征较为明显。第二,中部地区中,2008年以来实现有效追赶的省份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第三,西部地区区域分化较为严重,2008~2015年间能实现有效追赶的省份仅有3个:西藏、陕西和重庆。整体而言,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外部冲击之后,由于各地区所处增长阶段和发展能力不同,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基本趋于收敛,增速稳定回升。中部地区省份也表现出较好的增长收敛迹象。增长分化主要体现在东三省、内蒙古、山西以及河北等依赖资源和重工业发展的地区,对发达省份的增长追赶能力较差。

进一步,基于跨国增长经验显示的发达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基本都依赖于“高劳动生产率,高消费能力和高资本深化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模式的典型事实,对各个省份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东部发达省份已逐渐摆脱工业化阶段资本驱动主导的增长模式,部分中西部省份资本深化能力不强,可能导致增长动能不足。部分省份甚至出现了劳动生产率高于劳均资本的情形,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已不再依赖于资本要素,而技术、知识等新生产要素已取代资本要素成为新的增长动能源泉。第二,东部发达省份居民知识消费需求不足,将对城市化阶段主要依赖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增长效率造成阻碍。东部沿海及发达省份并未形成与其较高人均收入相匹配的消费结构的升级优化,知识消费水平表现较低。第三,部分中西部省份虽然表现出较快的增速追赶,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能力较弱,可能并未有效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对发达省份的持续有效追赶将面临阻碍。欠发达省份承接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虽然能获得有效的增长追赶,但不能盲目追随工业化发展模式经验,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和产业发展优势,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可持续增长路径。

实际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依托城市带的区域协调平衡的国家战略,为东中西部地区重新定位提出了要求。放在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效率模式的升级以及追赶雁阵也比较明显,这种区域间的雁阵模式隐含着同样丰富的经济机会和政策空间。一是从国际分工的层面看,东部地区——尤其是以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广州为龙头的城市圈,正在发生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向创新和内生增长路径的转变,这些地区通过接受国际分工互补的涓滴以及极化发展,已经在生活水平、学习能力和知识积累方面,具备了向创新跃迁的基础和条件:这种条件一方面体现为工业比重下降的同时,零部件密集和技术知识密集制造业有了发展,这些国内工业化先发地区对知识经济、高技术经济的重视,也有助于效率模式的重塑和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服务业业态的现代性和生产性——有助于技术、知识发展的科教文卫服务业基础较好且发展迅速,不仅为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能力提高起到了引领作用,而且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新常态时期效率补偿渠道的开拓。二是从中国整体特征以及路径选择来说,东部地区城市圈层的率先突破具有战略和趋势的导向作用。原因是,与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不同,中国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效应,将会延迟人力资本要素速度,即整体上不可能出现类似于日本、韩国在15~20年左右时间,高等教育迅速普及的跃迁状态。但是,如果不从全国平均,而是从大城市即城市带来看,人力资本状况却比较乐观。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是太大并且容易通过政策实现跃迁。这就是笔者认为新常态和城市化时期国家注重城市“作为知识(技术)生产配置极,而非物质产品生产中心”的原因。形成以大城市知识生产配置为重心、周边地区资本、劳动密集的区域互补雁阵,是区域协调的应有之义。三是从联系的角度来说,区域间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同样都是有利的,只要政策措施转向知识和创新的极化、而非资本和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劳动

力的过度极化。从全国范围来看,以东部城市圈层为知识和创新的“龙头”,且形成东部地区知识技术密集→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雁阵,可能更加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而且符合现阶段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就区域局部来看,城市化的一个作用,可能有利于各个区域形成以自身区域的发达城市为中心的局部区域雁阵,区域发达城市率先培育内生增长动能,并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张平. 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的效率提升与供给侧改革——2017年经济展望[J]. 现代经济探讨, 2017, (01): 5-12.
- [2] 楠玉, 刘霞辉. 中国区域增长动力差异与持续稳定增长[J]. 经济学动态, 2017, (03): 86-96.
- [3] Barro R. J.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Especially to China [R]. NBER Working Paper, 2016. 21872.
- [4] 蔡昉, 都阳.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 经济研究, 2000, (10): 30-37, 80.
- [5] 徐现祥, 舒元.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1978~1998)[J]. 经济学(季刊), 2004, (03): 619-638.
- [6] 林毅夫, 刘明兴.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 世界经济, 2003, (08): 3-14, 80.
- [7] 彭国华.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 (09): 19-29.
- [8] Demurger S., J. D. Sachs, W. T. Woo, S. Bao, G. Chang, A. Mellinger.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 Press, 2002, 1 (01): 146-197.
- [9] 齐绍洲, 李锴. 区域部门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差异收敛分析[J]. 经济研究, 2010, (02): 109-122.
- [10] 李静, 楠玉, 江永红. 中国经济增长1952~2013: 加速或减缓[J]. 财经科学, 2015, (07): 39-49.
- [11] 马孝先.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生驱动因素与多重耦合机制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 (05): 118-124.
- [12] 张平, 王宏淼. 中国转向“结构均衡增长”的战略要点和政策选择[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 (06): 61-86.
- [13] 刘伟.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1, (01): 4-11.
- [14] 靳涛, 陶新宇. 中国持续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解析与比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11): 74-89.
- [15] 刘长庚, 张磊.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研究新进展和转换路径[J]. 财经科学, 2017, (01): 123-132.
- [16] 袁富华, 张平, 刘霞辉, 楠玉. 增长跨越: 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经济研究, 2016, (10): 12-26.

## Study on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wards Medium-High Income Stage under the New Era

NAN Yu YUAN Fu-hua ZHANG P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nomic catch-up indicat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ble efficiency triangle mod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growth catch-up situation and the growth engine mechanism of provinc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growth of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provinces tends to converge with stable growth rate, and the growth differentiation of resource-based provinces, such as northeast region, are more serious. The developed provinces transforming from industrialized growth mode to urbanization model are facing the problem of growth engine conversion, while lack of knowledge consumption may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Som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can achieve effective catch up with the developed provinces, although some with weak foundation show higher growth rate, due to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deepening ability is weak, sustained and effective catch up may face obstacles.

**Key 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rowth catch up; growth engine conversion; medium-high income stage

责任编辑: 陈明